



明年“双减”仍将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

教育部将加大督办通报约谈问责力度推动“双减”取得新成效

核心阅读:国家统计局在秋季开学后的专题调查显示,校内减负成效明显,作业负担明显减轻,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作业的时间比“双减”之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意。

热点关注

□ 本报记者 张维

“双减”,在2022年的教育督导中仍然稳居C位。“2022年,我们将继续把‘双减’作为教育督导‘一号工程’,特别要加大督办、通报、约谈和问责力度,推动‘双减’工作取得新的成效。”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平近日透露。

而即将过去的2021年秋季学期,“双减”工作也被证明卓有成效。国家统计局在秋季开学后的专题调查显示,校内减负成效明显,作业负担明显减轻,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作业的时间比“双减”之前明显减少,85.4%的家长对学校课后服务表示满意。《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72.7%的家长反映教育焦虑有所缓解。据学校直报平台,教育部收到了7714万份家长无记名的调查问卷,97.3%的家长反映对学校新学期的减负提质工作表示满意。

家长再无作业

最明显成效体现在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说,各地各校

普遍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作业的校内公示制度,作业总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规定要求。据统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目前的90%以上。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本学期教师没有再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这也是过去家长们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个学期得到了有效的根治。”吕玉刚说。

同时,课后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各地各校“一校一案”制订了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普遍开展了课后服务。在时间上,基本上实现“5+2”的全覆盖,也就是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保证课后服务的结束时间能够与当地正常的下班时间相衔接,便于家长来接孩子。课后服务的项目质量也得到了有效提高,各地各校把课后服务作为进一步彰显学校办学特色,落实全面育人、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有效解决家长“三点半”接孩子难问题的重要举措。

据教育部直报平台摸底调查,有92.7%的学校开展了文艺、体育类的活动,88.3%的学校开展了阅读类的活动,87.3%的学校开展了科普、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课后服务的吸引力显著增强。在课后服务工作中,广大教师积极付出,有91.7%的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同时各地各校还选聘了20余万名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课后服务工作。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目前的91.9%。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改革也随之深化。各地认真落实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普遍把落实“双减”工作的举措和成效纳入义务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切实发挥好评价“指挥棒”作用。着力扭转唯分数、唯升学的不利倾向,积极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全面提升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减负提质并重

为学生减负的“双减”,是否有可能将学生的学业水平“拉”下去,学业质量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无疑是令家长们最为疑惑和关注的问题。

对此,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李志伟认为,“双减”减的其实是过重的和没必要的负担,根本目的是让孩子们能够在遵循成长规律的前提下,高效学习,健康快乐生活,实现全面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在学校里要求‘减负’和‘提质’并重。学校在学的管理中,注重高效课堂,优化作业设计,加强考试管理,提升学业质量,让我们的学生‘吃饱’‘吃好’”,李志伟说。

做好课后服务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校长陈立华认为,不仅要减负,还要提高质量,让孩子们在课内、课后都能够健康成长,让学校这个育人的主阵地,在学生成长中确实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此,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打造高效课堂,确保学生学会、学足、学好。课后提供丰富的供给,保证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在提出课后供给过程中,也特别强调2个小时怎么去设计,怎么能够发挥好这2个小时的育人功能。具体分两个方面:一是做好作业辅导;二是让学生学全面发展。”

“虽然我们把它称为服务,但对于学校来讲,是把

它做成课后课程。”李志伟补充说,我们集中优质资源,最大程度丰富学生选择,拓宽成长渠道。我们在提供课后课程的时候,还特别注重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比如说一个年级开展数学学科课后课程,全年级18个班打通学习,既有培优班,也有针对一些基础比较薄弱的孩子们提供的“提高班”,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同时,也把课后课程质量纳入学校评教评学的体系当中,每个月评一次,学生背对背地给学校老师打分,给我们聘请的校外机构老师打分,对于评价较低的老师,会通过谈话督促老师改进。

三大问题待解

那么,教师的负担是否会因此增加呢?吕玉刚坦言,“双减”工作实施以来,由于很多老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工作,客观上确实给老师增加了一些新的负担,这是现实。“对老师的负担问题,从组织上、从我们教育部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要努力去创造条件,尽可能地做到不要让老师的负担过重。当然,我们也要鼓励老师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发扬人民教师的崇高精神。”同时,要积极探索推行教师的弹性上下班制度。根据教学安排,学校要统筹好三点前和三点半后老师的工作安排。

不能否认的是,已有学校反映在开展课后服务方面还存在师资、场地、经费等问题,这些都有待进一步解决。

要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在吕玉刚看来,需多措并举。首先是学校内部要挖潜用力,充分调动和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是按照国家标准,把学校空缺的编制、空缺的老师要补齐,补到位。吕玉刚透露,

教育部和中央编办已经沟通,达成一致意见,形成了文件。要依照国家中小学编制标准,以县为单位,核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老师,由更多的老师来分担课后服务工作。再次,要系统调,即学校之间在当地教育部门的统筹之下,调剂余缺,吸引一些、安排一些有能力的学校到一些薄弱学校去支持做好这些学校的课后服务工作。最后,外部请,积极按照一定的程序,经过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合作,面向社会可以遴选一批有志愿从事课后服务的专业人士,参与学校的课后服务工作,包括体育、文艺和科普。

在场地问题上,则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吕玉刚说,因为每个学校的办学空间、条件不一样,在安排课后服务的时候,必须从学校实际出发。同时要统筹安排,充分挖掘利用好现有资源,比如不同时间段怎么统筹安排。比如体育馆比较缺,前一个小时可以安排一部分人,后一个小时再安排一部分人,把这些场地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学校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还应该就近走出去,我们周边有很多社会资源非常有益,学生也愿意去,“也可以两条腿走路,既可以有财政补贴,也可以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采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要按照规范的程序明确收费标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要由省里来执行,提出具体的办法,由省里去定相应标准。”“也可以两条腿走路,既可以有财政补贴,也可以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采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要按照规范的程序明确收费标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要由省里来执行,提出具体的办法,由省里去定相应标准。”

在经费问题上,中央已明确提出要通过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来保障课后服务经费,具体操作要由省里来执行,提出具体的办法,由省里去定相应标准。“也可以两条腿走路,既可以有财政补贴,也可以有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采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要按照规范的程序明确收费标准,不管采取哪种方式,都要由省里来执行,提出具体的办法,由省里去定相应标准。”

银保监会对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进行管理

提高资金兑付能力防范被动变现降低产品净值

□ 本报记者 周芬楠

自今年9月8日开始征求意见后,几经论证,银保监会于日前正式发布《理财公司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完善理财公司制度规则体系,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资金兑付能力,防范被动变现降低产品净值,保障投资者申赎的权利,继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办法》共七章四十五条,主要包括总则、治理架构与管理措施、投资者交易管理、认购与赎回管理、合作机构管理、监督管理及附则。

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对于《办法》所称的流动性风险,是指理财产品无法通过变现资产等途径以合理成本及时获得充足资金,用于满足该理财产品的投资者赎回需求或者履行其他支付义务而发生的风险。

因无法变现或变现资金不足而引发的流动性风险,并非理财产品独有,而是所有理财类公司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共识。

依据央行、证监会、银保监会及外管局2018年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的要求,银保监会发布关于理财公司理财产品的《办法》。

据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晓宇介绍,针对公募基金等流动性风险管控问题,证监会已发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资管业务,不仅仅涉及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还存在银行、证券、期货、信托、保险资管机构等领域。”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刘力说,只要是资产管理业务,都得依照《资管新规》的要求,受人之托,代客理财,忠人之事。比如就商业银行而言,也要保障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只有流动性充足,才不会发生客户挤兑现象,继而做到安全和盈利。

据刘晓宇介绍,正是基于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控的要求,增加银行体系的高流动性资产储备水平,减少流动性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冲击力,2018年7月银

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构建了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框架。

风险管控主体责任明确

强力介绍,对理财产品流动性管理,贯穿《办法》各个章节。首先在组织机构方面,《办法》明确,理财公司承担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理财公司应当按规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专业审慎、勤勉尽责地管理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确保理财产品投资运作稳健、净值计价公允,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刘晓宇表示,对于理财公司的要求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要求理财公司建立健全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与治理结构,指定部门设立专门岗位,配备充足具备胜任能力的人员负责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二是承担理财产品投资运作管理职责的部门负责人对该理财产品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承担主要责任;三是理财公司应当指定部门负责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评估,并与投资管理部门保持相对独立;四是理财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第三方合作管理,确保及时充分获取相关信息,满足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管理需要。

其次在采取的主要措施方面,在君致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宇看来,理财公司主要通过持续监测开放式理财产品流动性风险,审慎评估该产品所投资各类资产的估值计价和变现能力,并在充分考虑声誉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交易对手风险等的可能影响时,提前作出流动性风险应对安排等方式进行风险管理。

一般而言,为了应对日常赎回,任何理财产品都会准备一定流动资金,但更为主要的应对措施是对可变现资产的处置。

强力认为,对于流动性风险管控,主要强调“匹配”。根据《办法》,开放式理财产品所投资资产的流动性,应当与投资者赎回需求相匹配,确保持有足够具有良好流动性资产,以备支付理财产品投资者赎回款项。

定期开放周期不低于90天的公募理财产品,应当在开放日及开放日前7个工作日内持有不低于该理财产品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券等易变现的产品。

其他开放式公募理财产品均应当持续符合上述比

例要求。对于开放式理财产品,在开放日前一工作日内,可变现资产的变现价值应当不低于该产品资产净值的10%。

据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对流动性风险管理在理财业务运行当中具体表现为,在理财产品设计阶段,应综合评估投资资产的流动性,投资者类型与风险偏好等因素,审慎确定开放式、封闭式等产品运作方式,合理设计认购和赎回安排;运行阶段,理财公司应当持续做好低流动性资产、流动性受限资产和高流动性资产的投资管理,提高资产流动性与产品运作方式的匹配程度,并提前作出安排。

推动向净值化管理转型

推动理财产品向净值化管理转型,继理财产品管理公司等规定后,再次被银保监会提及。

其实,向净值化管理转型,是所有理财产品的追求,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必经之路。

刘晓宇说,《资管新规》要求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实行净值化管理。“净值化”是与此前“预期收益型”资管产品相对应的概念,“预期收益型”要求金融机构按照既定的利率向投资者支付收益,无论资管产品投向的底层资产是否最终给金融机构带来收益,即“保本保收益,刚性兑付”。净值化转型打破了这种预期收益率带来的刚性兑付,不得再向投资者承诺“保本保收益”,投资者需要对其投资自负盈亏。

净值化转型的核心是使理财业务回归“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本源,投资者自己承担投资风险,同时也享受投资可能带来的高额收益,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理财产品流动性不足将无法充分保障投资者赎回的权利,会引发产品兑付风险,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不良影响。刘晓宇认为,在部分投资者提出赎回申请而产品流动性不足时,管理人为了满足赎回需求,可能采取违反投资策略或违背投资者利益的措施,被动变现资产导致产品净值降低,损害产品其他投资者权益以满足部分投资者的赎回申请。若管理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满足赎回需求,可能导致投资者维权事件,对金融机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若进一步导致投资者大规模赎回,触发巨额赎回机制,产品运作将面临更大困境。

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加大禁塑监管执法力度

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两千多万件

本报讯 记者邢东伟 翟小功 通讯员陈正 2020年12月1日《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实施以来,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持续加大列入禁止名录的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仓储、运输、销售、使用环节全链条的监管执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全省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10.29万户次,立案4102宗,罚款697.6万元,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2000多万件。

据介绍,海南省成立生物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全国率先编制发布《全生物降解塑料及其制品通用技术要求》《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核磁共振波谱快速检测方法》《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指纹图谱快速检测方法》3项地方标准。

同时,结合海南地域特点和气候条件,建立覆盖全类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完整的标准体系,完成“海南省全生物降解塑料产业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已通过专家评审。协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制定《生物降解塑料环保认证规则》,已于2020年12月31日发布实施。

海南积极借势国内相关领域前沿力量,与北京理化测试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吉林质检院等检测、

科研、教学机构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中科院理化所合作建立海南省降解塑料技术创新中心检测技术研究实验室,开展技术攻关和科研创新,实现生物降解快速检测标准制定方面在全国走在前列,获得资质认定(CMA)、实验室认可(CNAS)项目22个降解塑料产品类别328个参数的降解塑料检测能力。该实验室的建成填补了全省检测空白,“降解材料质量安全评价与研究”获批建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

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将农贸市场作为禁塑执法、宣传重点领域,局领导带头深入农贸市场明查暗访,调研落实禁塑情况,引导和督促市场主体主动响应政策,在经营活动中禁止销售、使用,提供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组织各市县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商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集中约谈农贸市场开办者,要求所有集贸市场公开承诺,确保所开办的农贸市场不得出现销售、使用违禁塑料制品的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已对6家未履行禁塑主体责任的农贸市场开办者立案查处,并公开曝光。

海南省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禁塑监管执法力度,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采取曝光典型案件、公开销毁,以案说法等各种方式开展禁塑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为保障中欧班列安全高效通行,内蒙古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中欧班列优先查验、防疫物资专用通道,车体检查信息化等一系列便利举措,为中欧班列行按下“快进键”。图为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对通关列车进行车体检查。

本报记者 颜爱勇
本报通讯员 杨金焯 胡雷国 图/文

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桐乡积极构建数字复议新格局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进行时

□ 本报记者 王春

走进浙江省桐乡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大厅左侧易拉宝上“数字司法复议为民”红色大字赫然醒目,下方是行政复议小程序二维码,扫码即可实现行政争议云解决。

桐乡市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张月萍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近年来,桐乡市司法局全面深化“数字法治、智慧司法”信息化体系建设,在全省率先启动互联网行政复议建设项目,通过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信息管理系统,研发“桐乡市行政复议”小程序,积极构建服务便捷化、办案智能化、管理科学化、决策精准化、公开常态化的数字复议新格局,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

打造智能化平台公开便民

数字听证室位于桐乡市矛调中心三楼,集齐电脑、数字大屏等现代化设备,科技感满满。

“首先请申请人就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作简要陈述。”桐乡市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朱丹丹语声落下,一起违停行政复议案件听证开启,在视频画面里的当事人鲍女士,开始讲述她在新世纪公园南门广场的停车经过,她认为自己车辆停放的位置并未影响到其他车辆或行人通行,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违法事实不清。

紧接着,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开始视频答辩,再一轮的提意见、补充意见、提交材料,开始调解……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人的讲话语音同步自动转写全程记录在电子质证系统。

朱丹丹告诉记者,“申请数字复议的案件,案情都相对简单,大多是违停、垃圾分类等,一半以上可以调解成功,让老百姓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化解行政争议。”

推动一体化衔接高效协同

为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应用,去年6月,桐乡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综合行政执法局,政务数据六部门成立“法治联盟链”。

2021年3月12日,桐乡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治联

盟链”节点成员单位人员在巡查中发现市区某电瓶车销售点存在违法铲除店门口公共绿化带的行为。核实后,执法人员对店主王女士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王女士对处罚决定存在异议,她通过微信小程序,在线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在桐乡市行政复议局,工作人员在区块链平台上输入“证据提取码”后,屏幕上就自动跳出执法过程中的原始数据,包括执法照片、视频等,来源于执法人员随身佩戴的设备,可以在执法过程中自主记录,自动上传,通过公证存证应用实时接入,加密固定,并以唯一的存证编号出具《存证函》上链存储。

行政复议机关根据案件事实,行政审判数据库类案智能审查模型以及自动关联法条,依法维持综合行政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经行政执法机关确认后,自动生成非诉执行申请书并推送至法院,法院执行局收到非诉执行申请书后,进行智能审查,并依法智能出具非诉裁定书,形成整个行政执法闭环。

收到非诉裁定书后,王女士认识到悔悟的严重性,及时联系人员拆除硬化设施,绿化带恢复原貌。

桐乡市司法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国强介绍,“法治联盟链”的成立,通过证据链智能感知,建立与行政执法数据打通,实现政法一体化的跨域衔接,推行‘行政争议一件事’有助于行政执法更加公开、透

明,让老百姓信服;行政复议局,法院工作人员则可以直接链上提取完整、验证真实、可回溯的证据材料,大大缩短查验证据真实的时间,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发挥主渠道作用源头解纷

如何将更多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在基层、初发阶段和行政程序中,成为体制改革后桐乡行政复议面临的新课题。聚焦违法建筑强拆等,桐乡通过全流程设置监测节点,全过程固定证据要素,全时段进行跟踪预警,从源头减少争议问题的发生。

桐乡市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科长沈斌飞说,“每组织一次听证也是一场普法过程,随着数字复议的推进,类似垃圾分类、违法停车等案件,我们通过关联行政复议数据库,行政案件审判库,智能化推送信息,及时告知当事人类案处理结果,败诉风险智能预警等信息,让当事人对事实和法律规定了然于胸,推动诉源治理实现源头解纷。”

截止至2021年11月底,桐乡全市共收到行政复议案件95件,调解率为31.5%,同期行政复议诉讼案件为54件,复议案件数量远超行政复议诉讼案件数量,复议调解率约是诉讼的2倍,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100%,进一步畅通了行政复议便民渠道,发挥了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促进了行政复议案件公正高效办理。